

燃烧在冬夜的火柴

——读毕淑敏《花冠病毒》

毛艳青

庚子年伊始，新冠病毒冲出潘多拉魔盒，尘封已久的“隔离、疑似、确诊”等特殊字眼重新进入大众视野，人们的思绪被拉回到17年前的春天。每天清晨，人们的心情被不断攀升的确诊病例数字所撕扯，焦虑、紧张等负面情绪源源而来。对于普通人而言，除了尽量少去人员密集场所，在物理状态上远离病毒来源，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滋养心灵，保持内心的明净澄澈？我的方法是读书，我就是在这样的境遇下与毕淑敏的《花冠病毒》不期而遇的。

2003年，毕淑敏受中国作家协会派遣，深入北京抗击非典一线采访。历经数年沉淀，于2011年完成此书。作为一个有医学背景的作家，毕淑敏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、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、细腻优美的笔触，为我们当下抗击新冠病毒提供了观照。

冤有头，债有主。在每天被禁足的百无聊赖中，国人试图找到这一切的罪魁祸首。病毒的宿主一开始被锁定为蝙蝠，接着是蛇，接着又有专家出来说穿山甲可能是病毒的中间宿主。在《花冠病毒》中，病毒的来源被设定为藏匿于冰川中的某种史前病毒，而这种病毒之所以能发挥出洪荒之力，是因为气候变暖导致冰川融

面对病毒来袭我们能做什么

——《病毒来袭》读后有感

黄 岚

庚子年春节不同寻常，源自江城的新冠肺炎肆虐全国。在没有特效药的今天，切断与病源的联系、居家隔离是行之有效的措施。此时，我看了内森·沃尔夫的《病毒来袭》，颇有感触。

作者内森·沃尔夫，曾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，在约翰·霍普金斯大学做博士后研究。毕业于名校的他，并不安于在美国大学校园内爬象牙塔，而是长期置身于亚洲和非洲的丛林，追踪人类传染病的起源，进行现场流行病学研究。本书主要从物种进化的角度整体观测人与病毒的关系，尤其是病毒在动物和人之间的传播，包括审视当今社会经济全球化、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的变迁对新发再发传染病流行的影响。

面对病毒来袭，我们苦无良策，就像2003年的SRAS病毒，以及这次的新冠病毒。这些病毒不但造成人员死亡，还给人们的生活、生产造成极大影响。在人类文明史上，“事实上，不可见生物才是地球上真正的主角，它们包括细菌、古菌、病毒以及很多显微镜下才能看见的真核生物。”作者指出的这个事实，让我不禁反思，细菌、病毒以不可见不可知的方式袭击人类，袭击不守自然法则的人类，人类要受到怎样的惩罚，才会收敛自己的狂妄？有点夸大的事实是，人类的身体细胞组织被各类细菌病毒所占有，真正人类的细胞与其他微生物的数量相比，所占比例极小，这让我觉得不可思议。我们需要重新认识自己的身体，认识人类本身。病毒袭击的恐怖更在于它的变异性，往往人类还没找出它的结构，病毒就已产生了下一代。人类需要怎样学习，才能

真正跟上它的步伐？

面对病毒来袭，我们能做什么？病毒带来的负面影响，我们已经切身体会到了，街道空旷，人们躲避在家里，以隔离的方式避免沾染病毒。但在作者看来，病毒并不全是坏的。人类研制出来的病毒疫苗，就是一种可利用的“好”的病毒，人们用它来预防另一种更致命的病毒，譬如天花疫苗。另一些疫苗，像口服脊髓灰质炎病毒疫苗和麻疹、腮腺炎、风疹混合疫苗（MMR）则是减毒活疫苗（实验室培养的活病毒）。此外，还有一种病毒疗法，即以毒攻毒的治疗，比如塞内卡山谷病毒是一种天然形成的病毒，它明确锁定生长在神经和内分泌系统交汇处的肿瘤细胞，在肿瘤细胞内繁殖，引起细胞溶解或者破裂和死亡。这种病毒具有令人惊讶的选择力，精准锁定神经内分泌系统的癌细胞，却不感染健康细胞。如果医学界在这方面能取得临床突破，那该多好啊！

面对病毒来袭，我最感兴趣的是，我们应该怎样预警，怎样防范？在没有行之有效的办法控制病毒爆发感染的情况下，若能事先警觉，能及时采取措施，哪怕是“隔离”这个最原始的办法也是好的。如果我们能利用现代科学技术，就能将流行病预测和预防做得更好。令人欣慰的是，目前有个环球病毒预警行动组织正在开展工作。当然，对付病毒或细菌造成的流行病，更需要公众增强风险意识，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。比如不乱吃野生动物，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。本书作者提出以下几条预防传染病的方法，或许对你有帮助：接种最新的疫苗；乘坐地铁和飞机后要洗手；与人握手后尽快洗手；尽量不用手碰鼻子和嘴；尽可能保证饮食卫生……

希望当病毒再次来袭时，我们已经吸取教训。

鲍静静

瘟疫笼罩着20世纪40年代阿尔及利亚的一座小城奥兰，这里没有鸽子，没有树木，没有花园。春天没有任何征兆，夏天尘土飞扬，秋天大雨滂沱满城泥浆，冬天寒冷刺骨。这是加缪的小说《鼠疫》所描述的世界。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说，经典常读常新。庚子新春的这场疫情，让我重新翻开《鼠疫》一书。

《鼠疫》里写到，奥兰知名医生里厄，目睹老门房米歇尔死亡，他将其血液拿去化验后证实了猜想：里面有导致鼠疫的粗短形杆菌。之后，里厄尽己所能，始终冲在第一线保护奥兰民众，使他们不受鼠疫的侵扰。但鼠疫结束后，里厄还是失去了妻子，也失去了并肩作战的伙伴塔鲁——他带领了第一支志愿队，也带动了其他防疫队的组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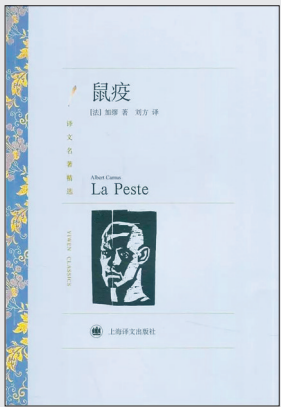
生活比小说更鲜活。没有岁月静好，只不过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。譬如，全国有千万名医护人员驰援湖北，我们的医护人员是“国有战，召必回，战必胜”。他们在紧急关头打起背包赶赴机场，他们是勇敢的逆行者，是新时代

在黑色疫情里体悟温暖

——重温加缪的《鼠疫》



居家养神 阅读养心



化。两种截然不同的出处，其实最后的指向是殊途同归的，无节制的人类活动破坏了人和自然之间微妙的平衡，原本与人类和平共处的病毒只能撕掉面具，离开自己的领地，向人类发起攻击。

没有一滴雨认为自己造成了水灾。当每一个恶行的链条足够漫长，长到处在每一个环节的人都看不到这个链条的全貌时，这个链条上的每一个人似乎都有理由觉得自己无辜。但愿深刻的教训能让每个人有所警醒并收敛，不然，下一次雪崩免于难的就未必是你。

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，国人对湖北和武汉两级政府的反应颇有微词。是不是存在瞒报？是不是低估了病毒的传染力？是不是采取措施晚了些？公众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追问职能部门很正常，应该被理解。在《花冠病毒》中，就描述了面对不断攀升的因病毒致死的病例，燕市抗疫指挥部总指挥袁再春决定向公众隐瞒真实数字，每天只是将修饰过的不治人数公之于众。《乌合之众》里有句话令人印象深刻：“掌握了影响群众想象力的艺术，也就掌握了统治他们的艺术。”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非常时期，有时候我们真不能把决策者的行为简单归咎为没有担当。

疫情发生后，每个人都希望能尽快研制出将可恶病毒一剑封喉的特效药，在某些因素的误导下，甚至出现一些药物被抢购一空的场景。《花冠病毒》中就用了很长的篇幅聚焦抑制病毒的特效药，它被称作“白娘子”，当中富含“锶”。尽管它在罗纬芝的身上获得奇效，在后来陈天果以及它的发明者詹婉英身上的应用却是一波三折。燕市市长陈宇雄的孙子陈天果由于尚处稚年，免疫系统发育不全，感染花冠病毒后，用上了“白娘子”却收效甚微，最后是有赖于感染康复者罗纬芝的血清才得以死里逃生。而在詹婉英的身上，同样存在着由于年龄导致的剂量不可控的因素。在人类与疾病对抗的历史中，药到病除固然皆大欢喜，但在与某些尚未找到特效药的痼疾的斗争中，我们不可忽视自身免疫力和乐观心态的强大作用。

《花冠病毒》一书还对非常时期的社会关系做了描摹，比如隔离中的男女关系，人们是不是更渴望爱与被爱，去消解长时间与世隔绝带来的禁锢；比如疫情期的社会治安，短期的足不出户尚能被接受，但如果疫情的阴霾久久不能消散，那每个人心中的自觉真的牢不可破吗？

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，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。这几天翻朋友圈，我常常看到这句话。在等待冰雪消融的日子里，不妨打开《花冠病毒》，屏气静心，在字里行间聆听“春姑娘”的脚步。

埃博拉是一条河

——《血疫，埃博拉的故事》读后

崔海波

《血疫，埃博拉的故事》是一本非虚构作品，作者理查德·普雷斯顿是《纽约客》撰稿人，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，英文博士，擅长以非虚构手法处理科学题材。本书出版后长踞《纽约时报》非虚构类畅销书榜首达61周，普雷斯顿因此获得了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颁发的“防疫斗士”奖。

埃博拉是一条河流，位于非洲刚果北部。1976年，一种不知名的病毒光顾这里，疯狂地屠杀埃博拉河沿岸55个村庄的百姓，致数百人死亡，“埃博拉病毒”因此得名。

《血疫，埃博拉的故事》虽然是一本非虚构医学类作品，但故事情节类似惊悚大片。书的开头讲述了一个悬疑故事：1980年，一个名叫夏内·莫尔的法国人前往非洲探访埃尔贡山的奇塔姆洞，7天后出现头痛，随后呕吐、高烧、眼睛发红，整个人变得冷漠迟钝，面部失去了活力，仿佛一具僵尸，最后流血崩溃至死。书中对他濒死状态的描述读来令人战栗，人类在病毒面前是如此渺小，如此无助，如此不堪一击。一位名叫谢姆·穆索凯的医生在施救时，夏内·莫尔的呕吐物溅入他的眼睛和口腔，导致感染。但谢姆·穆索凯医生幸运地活了下来。1987年，一个名叫彼得·卡迪奈尔的少年也同样出血崩溃至死，经过分析，确认少年也感染了和夏内·莫尔一样的病毒。这两个人，相隔7年因为同样的病毒悲惨死去，他们的足迹在全世界只有一处相交，那就是奇塔姆洞。1988年，几位科学家来到奇塔姆洞实地考察，却没有任何发现。

1989年11月，美国弗吉尼亚州的雷斯顿城又发生了埃博拉病毒事件，这里的灵长类动物检疫中心接收了100只从菲律宾进口的食蟹猴，没过几天，2只死亡。一般情况下，少量动物死亡是很正常的，但是令人不安的是，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，有29只猴子死亡。随着猴子死亡数量的增加，科研人员渐渐逼近真相：猴子感染了埃博拉病毒。之后，美军将大楼封锁，所有动物处死。

科学家尤金·约翰逊在他自己设立的实验

室里用埃博拉病毒感染了几只猴子，测试各种药物。为了寻找埃博拉病毒的宿主，他走遍了整个非洲，但无论怎么努力，都未能找到它们在自然环境下的藏身之处。没人知道这种病毒来自何方，找出埃博拉病毒的宿主是约翰逊最大的心愿之一。然而研究所里没人想参与他的这个项目，他们胆怯、恐惧、退缩，因为这种病毒太可怕了，他们不敢研究埃博拉，担心自己先被埃博拉“研究”了。后来一位名叫南希·杰克斯的病理学家加入了约翰逊的研究项目。南希·杰克斯是三个孩子的母亲，非常敬业，家庭事业一肩挑，有时还带着孩子外出考察。某次在解剖猴子时，她手上有血迹，以为是手套破了，自己已暴露在高危病毒环境下，恐惧几乎吞没了她。她战战兢兢地把最里面一层手套放在水龙头下，灌满水，手套像气球般膨胀起来，看来手套没有破，南希悬着的心终于落下了。面对病毒，说不怕是假的，是理想和信念支持着她在做好自我保护的情况下，探究医学科学奥秘。作者没有把科研人员塑造得高大上，他们有血有肉，真实可亲。

我是在紧张与敬畏交织的情绪中读完这本书的。有人称埃博拉病毒为“人类生命的黑板擦”，它可以在空气中传播，致死率50%至90%，但奇怪的是，它在小范围内爆发后突然就消失了。

与埃博拉病毒一样，鼠疫、SARS、流感这些病毒，看上去被人类战胜了，但事实上，它们并未真正消失，只是暂时隐藏起来了，说不定哪一天又会以另一种姿态卷土重来。人类与病毒的抗争如同埃博拉河源远流长。

在书的最后一章《奇塔姆洞》里，作者叙述了自己和几个朋友前去奇塔姆洞勘察的经过，他的随身包里有一个信封，里面是一份文件，有三页纸，描述了人类感染埃博拉病毒后的症状，以及相应的实验性治疗手段。一旦自己被感染，他准备取出来交给朋友们。这一细节足以说明作者的紧张，再勇敢的人，在病毒面前也会胆怯，但作者敢于冒险实地探索的精神令人敬佩，正是拥有这样一种敬业精神，才能写出如此震撼人心的作品。

最可爱的人。除了医护人员，还有许多党员干部冲在第一线，还有无处不在的志愿者和爱心人士，自觉负起责任，为居民保驾护航。这让我联想起《鼠疫》里的朗格，当防疫队需要志愿者时，他毫不犹豫地站出来：“我来干吧！”

加缪在《鼠疫》中刻画了一个投机分子柯塔耳，他送想要离开奥兰的人离开，借机走私稀缺物品，以此牟利发国难财。幸运的是，现实比文学丰富而温情。与小说截然相反的是，宁波涌现了一批捐赠口罩的爱心人士，多的捐赠了20万个。

除了投机分子柯塔耳外，《鼠疫》中的人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与鼠疫抗争。这其实也体现了加缪的存在主义哲学：无论世界多么荒谬，无论疫情怎样黑暗，都不要停止反抗。即便身处混沌，也要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。不少受害的个体在逆行者的感召下，加入了抗疫的队伍。

个人主义者朗贝尔本来跟柯塔耳商量一周后离开奥兰的紧急策略，临出发前他犹豫了，对医生里厄说：“可是只顾自己的个人幸福就会感到羞愧，你们不也是舍弃小我投入到了大众的防疫志愿队了吗？”朗格原本也是一个活在自己世界里的人，之所以投入抗疫的群体，是因为他觉得，鼠疫作为人类群体性的灾难，逆行抗战就是自卫。

今日四明大地，有多少个体民众，走出小我，在社区或居家投入抗击疫情的洪流中。扎根东吴的新疆姑娘为居家隔离的邻居送上饅头，95后网格员自制抗疫说唱MV礼赞逆行者；英雄都是勇于挺身而出的普通人/在这个时代每个人都担负着重任/要平安地归来/别让他们心寒/做好应对一切的准备/我祈愿国泰民安……

《鼠疫》里的记者塔鲁令我印象深刻，他是旁观者，更是反思者。他说：自我检点，尽量不把疾病传染给别人。唯有这样，才能回归内心的安宁。而通往安宁的途径之一就是同情心。新冠肺炎是我们共同的敌人，许多民众一边宅家，一边在内心呼喊：武汉加油！祖国必胜！

作者加缪通过一个存在主义者对世界荒诞性的透视，表现了自由、正义和死亡等有关人类存在的最基本问题。在新冠病毒肆虐的日子里，重温《鼠疫》，斗争、坚守、信念都有了特殊的内涵，其特殊性在于引领民众在灾难中感受悲天悯人的情怀。疫情剥夺了人们常态的富足及安适，馈赠了明确自身界限的清醒与理性，也必将让我们更加珍惜人间的美好和生命的欢乐。